

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及其实践效应

万才新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美国长期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最终把新中国推向了与美国对抗的地位，而苏联政府长期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的支持，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国的承认和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力支持，使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是新中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是开放的、独立自主的，它的实施有力地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大拓展了新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

【关键词】 “一边倒”；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国家安全；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2)02-0123-05

【作者简介】 万才新(1964—)，男，湖北鄂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审计处处长，五级职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第一个外交战略，它是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和判断而确立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对新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在对当时国内外形势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实践效应进行了客观评价。

一、“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一边倒”对外战略，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确立，世界各国都必须在外交战略上做出自己的选择。

从理论上说，新生的中国至少可以选择三种外交战略，即：对美国示好，与苏联疏远；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之下，新中国很难选择前两种战略。战后美国政府实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选择向美国示好。而如果选择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非但不能改变美国的敌视态度，反而会失去苏联的支持，最终导致新中国两面受敌而陷于外交上的孤立。

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

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①毛泽东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立方案进行了否定：“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反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来，并正在向前发展。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计划的檄文。”只要“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③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初步表明了革命胜利后的外交立场。

事实上，选择“一边倒”并非毛泽东的初衷。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抗日战争还在进行时,中国共产党曾经设想在美国和苏联两大国之间保持平衡。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史坦因时就曾谈到,要与美国和苏联都保持友谊关系,以便使中国成为美国和苏联两大国之间的一座桥梁。^④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内战一触即发,美国的对华政策明显倒向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46年4月20日仍致电周恩来,指示“不要准备对国共两方面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⑤1946年6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十年军事援蒋法案,公开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援蒋法案的出台,使得中共谋求与美国建交已无可能。内战爆发后,中共与美国公开处于尖锐的对抗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政治上,对新中国采取遏制和孤立政策,拒绝承认并极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顽固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经济上,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和禁运。军事上,对新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和武装威胁,并挑起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正是由于美国长期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最终把新中国推向了与美国对抗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外交上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就成为必然性的选择。

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自成立以来,就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是中国革命的可靠朋友。尽管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实行“弹性政策”。但客观地说,苏联从未放弃对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更没有采取过敌视的态度。毛泽东也一直对苏联采取尊重和友好的态度,并积极主动地寻求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以及在政治立场上主动亲苏的表现,使苏联的对华政策日益明朗化,最终选择了“联共弃蒋”。1949年5月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离开广州回到莫斯科,标志着苏联彻底放弃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对于苏联采取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援助,毛泽东曾列举说:“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

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⑥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可以说,“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一贯友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得国际格局和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做出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指出,中国政府愿意“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⑦至此,“一边倒”外交战略在新中国外交方针中的法律地位得以确定。

总的来说,在客观上,“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在主观上,对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认同,也是促使新中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的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列主义即科学的社会革命论以后,中国人精神上就由被动变为主动。”“主动地接受随十月革命炮声而来的革命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共反对帝国主义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认同。”^⑧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与苏友好的立场,在国际斗争中一直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力量一边。因而,尽管当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充分认可,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就其本质而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不可能加入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西方阵营。

二、“一边倒”是开放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一边倒”的思想是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强调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⑨后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并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使得这一方针法律化。新中国成立后,

中苏建交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这一方针的具体实施。

从形式上看,“一边倒”是毛泽东构想的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国际统一战线模式。毛泽东在总结党的经验时指出,在国内“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⑩而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所谓的“国际革命力量”就是指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所谓“联合国际革命力量”,就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构想的新的国际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同,是排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于统一战线之外的,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它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⑪“一边倒”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的,并没有局限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中国在联苏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抵抗美国时,也存在一定条件下讲和的一面。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不是封闭的、狭隘的,而是开放的、灵活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宣告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开放、灵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毛泽东认为,“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为此,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十分注意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二是毛泽东并没有拒绝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在经济活动中,要坚持“一要和平,二要通商”的原则,“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⑫在政治交往中,主张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不承认其同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

关系。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也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体现。所谓“一边倒”,并非“投靠”苏联,而是指与苏联站在社会主义的同一阵线上,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并非赋予苏联藉此发号施令、干涉中国内政的权利,而是坚持主张两国之间关系平等;向苏联学习,并非是说苏联可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颐指气使,而是坚持中国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有权探索符合自己国情、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接受苏联的援助,也决非意味着中国要为此付出损害本国主权和利益的代价。^⑬1956年12月,针对有人怀疑“一边倒”战略对不对时,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特意强调:“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⑭事实上,即使是在中苏关系最友好的时期,当苏联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危害我国的主权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这也是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发生严重矛盾乃至互助同盟分裂的根本原因。

三、“一边倒”战略的实施及实践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正式启动实施。为了得到苏联和斯大林对新中国的支持,解决中苏两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增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从北京乘专列出发访问苏联,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目的“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⑮这次历史性访问总体上是成功的,其重要标志是,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现了中苏战略结盟,为新中国获得苏联的援助确定了法律上的依据。苏联愿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帮助新中国,并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确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解决了中苏之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次访问为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

“一边倒”外交战略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客观而言,是与新中国的国情相适应的,产生了积极的实践效应,切实地维护了建国初期中国的国家利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一边倒”外交战略有力地保障了新中国的

国家安全,巩固了新生政权

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政权当时既面临着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又面临着美国的威胁。“国民党依仗海空军力量,对大陆沿海进行封锁和骚扰,威胁着这些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美国的威胁同样是十分显然的,西太平洋众多岛屿战后不是由美国占领或‘托管’,就是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不管美国的‘防卫线’是从朝鲜半岛到台湾到菲律宾,还是从阿留申群岛到冲绳到菲律宾,美国的这条新月形防线针对着中国是没有疑问的。”^⑥面对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半岛三个方面的战争威胁,新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找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确指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条约的第一条也明确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⑦正是由于这个条约的存在和中苏同盟的强大威力,才使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尽管与中国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抗,也不敢轻易入侵中国本土。

由此可见,“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安全意义是十分巨大的,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给我们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苏联存在,这鼓励我们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而且要到大陆来。”“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⑧

(二)“一边倒”外交战略为新中国争取了必要的国际支持和援助,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迅速获得国际援助,使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得以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并不太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他们甚至认为毛泽东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者”,^⑩中国共产党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随着“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的确立,斯大林和苏共逐步消除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误解。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向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提供大量技术资料以及培养一大批建设人才等经济援助举措,这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对奠定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及后来开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起了重大作用。据统计,从1950年至1957年6月,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资料4343套,截至1955年1月1日,在华苏联专家、技术顾问共计1300余人。与此同时,我国还派大批实习生、留学生到苏联等国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仅1955年就派留学生1890人。中苏还成立了科技合作委员会,定期互派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和专题科学研究。^⑪

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坦言:“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⑫刘少奇也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像的”。^⑬正是由于“一边倒”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良好的经贸往来关系。使我国能够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促进经济的复苏,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进行了有益的贸易接触和尝试,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三)实行“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大大拓展了新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政府纠集一些国家,形成了不承认新中国的阵线,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孤立、封锁和包围中国。而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由于苏联是当时公认的世界第二强国,因此,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已经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外交上迅速承认了新中国,断绝与国民党集团的一切外交关系,而且给予

了新中国大量援助,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新中国友好往来,新中国的外交局面迅速打开。截至1950年11月,已有6个亚洲国家和12个欧洲国家不仅承认了新中国,而且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掀起了第一次建交高潮。中国鲜明地提出“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方针,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不仅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紧密合作,而且在地缘上也连成一大片,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两国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步调一致,尽可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对反击美国的冷战攻势起了积极作用。在支援朝鲜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中,中苏两国也携手给予支持。此外,在对日和约的签订问题、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发动世界和平运动问题等一系列重要国际问题上,两国之间也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和做法,在提出主张后互相表示支持。这种密切合作的结果,加重了社会主义阵营说话的分量,使“一边倒”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周恩来指出,中苏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七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八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帝国主义是不愿意看见也不愿意了解新世界和人民力量的,像这次中苏缔约,都出乎他们的意料。和平阵营的行动击中了帝国主义的要害”。^④这是新中国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一大贡献。

注 释

- ①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690页。

- ③⑩⑪⑫⑬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6、1475页。
④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⑤ 逢先知:《毛泽东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5页。
⑦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88页。
⑧ 刘建平:《毛泽东的美国观与新中国“一边倒”国际战略的形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⑨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⑬ 丁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必然性》,载于《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10期。
⑭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⑯ 陶文钊:《中美关系:半个世纪的启示》,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⑰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⑱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⑳ 赵绍棣:《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457页。
㉑ 王俊:《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㉒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㉓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㉔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责任编辑 赵长峰]